

三松堂自序

西古六



# 三松堂自序

冯友兰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

封面设计：王师颀

责任编辑：曹月堂

### 三松堂自序

SANSONGTANG ZIXU

冯友兰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2印张 255千字

1984年12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2版

1989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10,100—12,600

ISBN7-108-00015-6/G·1 定价 5.20元



著者近影(一九八一年十月摄)

三松堂

著者自书  
一九八〇年

著者自书  
三松堂横额

二十一岁时的著者





# 马叙伦（石屋农人）篆书的小记释文

一九一五年冬，北大哲学门教授马叙伦辞职，以示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抗议，学生们请他合影留念。正中蓄须者是马叙伦，后排左起第二人是著者

乙卯之冬，余以归省先垄，言去京国。将遂伏影海隅，静修行履。太学之友，緬惟讲肄之久，欲慰离索之思。既造歌以宠行色，复命术人抚成是图。警款暂违，须眉永对。《书》曰：「天工人其代之」，维兹有矣。独念余学惭脱席，行愧人师，有「汝坟」之感，非行役之才。遂乃滥窃浮声，屡污黷序，虽复不掩固陋，倾吐所闻，未足宏赞

兹道，裁成大雅。

咨惟君子，不鄙

其人，相从以来，弥彰

情愫。嗟夫！余南

遵番禺，北极宛平，

虽仁义末由，敢

云矜式；而肝膈

相照，幸有同心。

方今之时，仲道

发叹于洛下，幼

安高举于海东，

远览存亡，未知

何极！塞此乱离，

允惟履德，用勉

君子，以为世则。

异日有报余以

四方高行之士者，

余知其必吾

党矣，中华民国

四年十二月，石屋

农人记于北京

大学。

北平大學文科哲學門第二次畢業典禮合影



前排左起第五人是北大校長蔡元培，第六人是文科學長陳獨秀，第四人是教授馬叙倫，第七人是教授梁漱溟  
第二排左起第四人是著者

一九一八年六月在北大哲學門畢業合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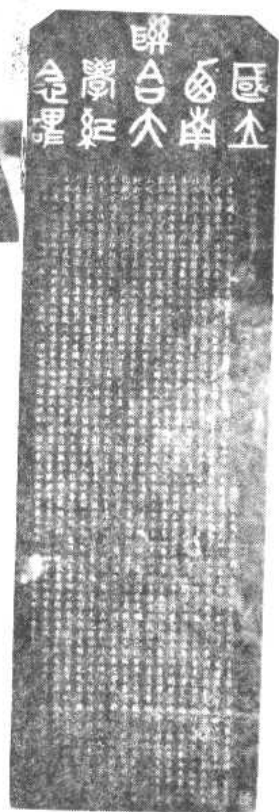
后排：中為太夫人吳清芝，左為夫人任載坤，右為著者  
前排：左起為子女：鍾璉，鍾辽，鍾璞（宗璞），鍾越



抗日戰爭前夕全家在清華園乙所合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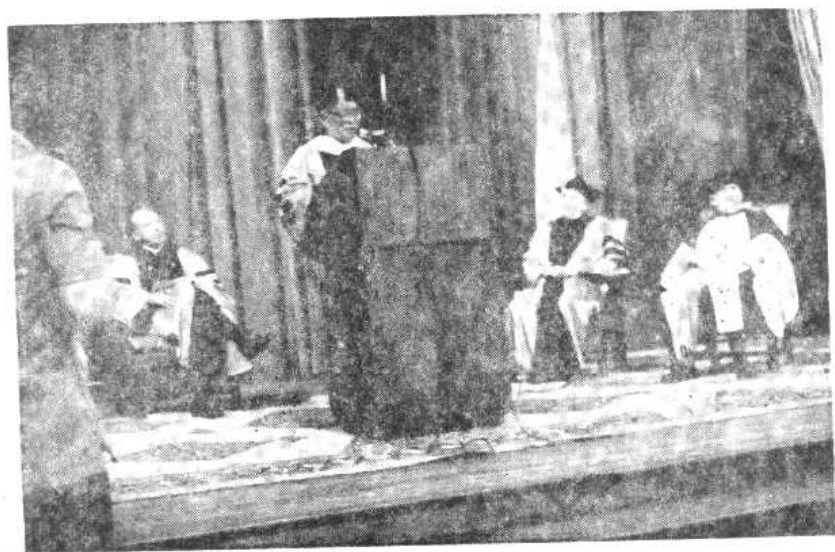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  
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揭幕前的著者。  
纪念碑上覆盖着联大校旗



一九四六年五月建立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旧址，今之昆明师范学院所在地



一九五一年在印度德里大学赠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的仪式上。  
前排左起第二人是著者，第三人是丁西林，第五人是印度总统  
兼德里大学校长



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在美国  
纽约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名誉  
文学博士学位时，著者在会  
上致答词

## 《自序》之自序

古之作者，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，每别作一篇，述先世，叙经历，发凡例，明指意，附于书尾，如《史记》之《太史公自序》，《汉书》之《叙传》，《论衡》之《自纪》，皆其例也。其意盖欲使后之读其书者，知其人，论其世，更易知其书短长之所在，得失之所由，传统体例，有足多者。

本书所及之时代，起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，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，其波澜之壮阔，变化之奇诡，为前史所未有。书于其间，忆往思，述旧闻，怀古人，望来者。都凡四部分：曰「社会」，志环境也；曰「哲学」，明专业也；曰「大学」，论教育也；曰「展望」，申信心也。长短不同，旧日小说家所谓「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」也。揆之旧例，名曰《自序》。非一书之序，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。世之知人论世、知我罪我者，以观览焉。

「三松堂」者，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，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。庭中有三松，抚而盘桓，较渊明犹多其二焉。余女宗璞，随寓此舍，尝名之曰「风庐」，谓余曰：「已名之为『风庐』矣，何不即题此书为『风庐自序』？」余以为昔人所谓某室某庐者，皆所以寄意耳，或以松，或以风，各寄所寄可也。宗璞然之。

书中所记，有历历在目，宛如昨日者，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，余亦届耄耋，耳目丧其聪明，

三松堂自序

二

为书几不成字。除四、五、六章外，皆余所口述，原清华大学哲学系涂生又光笔受之，于书之完  
成，其功宏矣，书此志谢。

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冯友兰

# 目 录

《自序》之自序 ..... 一

## 一 社会

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 ..... 一

第二章 民国时期 ..... 三

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..... 三

## 二 哲学

第四章 二十年代 ..... 一九九

|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五章  | 三十年代    | 二二五 |
| 第六章  | 四十年代    | 二四八 |
| 第七章  | 五十年代及以后 | 二八三 |
| 三    | 大学      |     |
| 第八章  | 北京大学    | 三一七 |
| 第九章  | 清华大学    | 三三四 |
| 第十章  | 西南联合大学  | 三五二 |
| 四    | 展望      |     |
| 第十一章 | 明志      | 三六五 |

# 一 社 会

## 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

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四日（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六）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父的家里。祖父名玉文，字圣征，有三个儿子。我的父亲行二，名台异，字树侯。伯父名云异，字鹤亭。叔父名汉异，字爽亭。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（一八九八年）科进士。伯父、叔父都是秀才。在祖父教育下，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，进入了「耕读传家」的行列。

听家里传说，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，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。祖父曾经去考过秀才，本来是可以录取的，不知道怎么跟当时的县官闹了点别扭，有人劝祖父去疏通，祖父不肯，就没有录取。祖父从此就不再去应试了，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。可是他的诗作得很好。他作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试帖诗，而确实是一种文学作品，传下来的几十首诗，编为《梅村诗稿》。他的诗有一种冲淡闲适之趣。当时邻县的新野县有位名士赵一士，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：

身处人间世，

### 三松堂自序

心怀太古春。

风流伊上叟，

击壤作尧民。

是以邵雍的《击壤集》来相比的。

我的伯父也能作诗，他把自己的诗编为《知非斋诗集》。父亲也能作诗，有《复斋诗集》。我的一个姑母也能作诗，可惜十几岁就去世了，留下的诗，家里的人编为《梅花窗诗草》。

我们这一门有一种作诗的家风。我有一个偏见，认为作诗必须有一点天赋才行。宋代的严羽说：「诗有别材，非关书也。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」（《沧浪诗话·诗辨·五》）这两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。有些人学问很大，可以下笔千言，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，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，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写出来，但就是不是诗。

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，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。在清朝末年，我们那一带土地很集中，大地主有两万多亩土地。有几千亩土地的地主很不少。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，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，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。

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，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，家里请一个先生，教这些孩子读书。女孩子七岁以后，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，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。在我上学的时候，学生有七、八个人，都是我

堂兄弟和表兄弟。我们先读《三字经》，再读《论语》，接着读《孟子》，最后读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。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，才算读完，叫做「包本」。有些地方读「四书」不仅要背正文，还要背朱（熹）注，不过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要求。

当时一般的私塾，叫学生读一些记诵典故和词藻以备作八股文、试帖诗之用的书，如《幼学琼林》、《龙文鞭影》之类，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。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，叫做《地球韵言》，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。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「新学」。我们家的那个私塾，也算是新旧兼备了。照我们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，于「四书」读完之后，就读经书。首先读《诗经》，因为它是韵文，学生们读起来比较容易上口。我于读完《诗经》之后，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。

我的父亲成进士以后，以知县任用，分发到省里去。照清朝的传统办法，分发到哪一省，是由吏部抽签决定的。在清朝末年，这个朝廷公开卖官，一个人捐给朝廷多少钱，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官，当时称为「捐官」。即使是由科举得来的官，在吏部分发的时候，也可以出一笔钱，不由抽签，而由自家指定，愿意到哪二省，就到哪一省去。除了本人原籍那一省之外，其余的省可以自己指定，称为「指省」。我的父亲以母老为辞，不愿到边远地方去，用「指省」的办法，分发到湖北。因为湖北是河南的邻省，唐河县跟湖北省枣阳县是邻县，唐河这条河在襄樊入汉江，一直通往汉口。我们家乡这一带，按政治区域说属于河南，按经济区域说属于湖北。我们那一带的贸易往来和货物出入，都是通过唐河、汉江，到汉口的，所以汉口、武昌这些地名，对我们那一带人说都是很熟悉的。我的父

亲是哪一年往汉口、武昌去的，我现在记不清楚了，只记得他是一个人先去的，去了以后还回来过一次，那一次他是到襄樊出差，公事完毕后到家里看看。当时父亲在武昌还没有得到固定的差使，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候补。所谓「候补」，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，去补那个缺。补上了缺，称为「得缺」。本来这些有资格候补的人，都是科举出身的，后来因为有捐官，所以候补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可是缺还就是那么些，所以「得缺」越来越困难，朝廷又开了一种卖官的办法，就是候补的人可以再花一笔钱，买到一个优先补缺的权利，称为「遇缺先」。没有「遇缺先」特权的人，就成了「遇缺后」了。所以《官场现形记》写的那些情况都是有的。

大概在光绪三十年左右，我父亲终于在武昌得到一个固定的差使。那时候，在武昌作两湖总督的是张之洞，他办了一些洋务，一些新政，其中有一样是办新式教育，在武昌办了一所外语学校，叫「方言学堂」。学校的监督（相当于后来的校长）由当时的一位大名士梁鼎芬担任。我父亲被委派为会计庶务委员（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）。梁鼎芬当时是武昌府知府，方言学堂监督是他的兼职，他大概也不经常到校办公，所以我父亲实际也管除了教务以外的学校各种事情。有了这个比较固定的差使，一个月有比较固定的收入，于是写信回来同祖母商议，叫我母亲带我和弟弟景兰、妹妹淑兰（沅君）三人上武昌安家。当时唐河老家这个大家庭的人，听到这个消息，都觉得是一种空前未有的头等大事。因为在地主阶级中，家眷向来是不出门的。当时我听见大家庭中的人纷纷议论，原则上同意我母亲带着我们去，可是路怎么走，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。那时候京汉铁路已通，我们可以先